

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前沿文丛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

郑江淮 / 著

人民出版社

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

郑江淮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赟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郑江淮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前沿文丛)

ISBN 7-01-004205-5

I.企… II.郑… III.企业家-行为-研究 IV.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737 号

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

QIYEJIA XINGWEI DE ZHIDU FENXI

郑江淮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73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4205-5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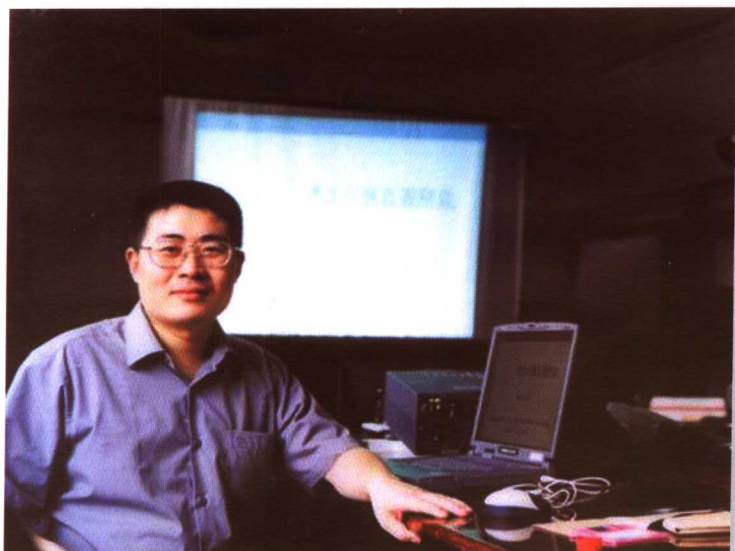
《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前沿文丛》编委会

主 编： 洪银兴 刘志彪 范从来 沈坤荣

副主编： 安同良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伟	刘小川	刘 东	刘志彪	孙宁华
安同良	李晓春	李晓蓉	杨德才	沈坤荣
尚长风	范从来	郑江淮	姜 宁	洪银兴
夏 江	顾 江	高 波	梁东黎	葛 扬



作者简介

郑江淮，196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南大商学评论》副主编。199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从事企业、产业组织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出版《非国有企业成长的金融依赖：对转型期金融和企业协同演进的实证研究》等著作，翻译了《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费景汉、拉尼斯）、《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青木昌彦）、《公司治理：理论与经验透视》（Xavier Vives.ed.）等专著，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多项国家级课题。曾获江苏省第8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等奖（2003年），获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优秀论文奖（2001年）。

序

献给读者的是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系列研究成果，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或转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经济发展阶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此发生了多个层面的变化：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转向

买方市场；宏观经济不均衡的主要特征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成为结构变动的重要推动力；等等。与此同时，转型中的摩擦和矛盾逐步显现，市场秩序的混乱，信用的缺失，失业和下岗的剧增等无序现象又成为经济转型的阻力。对转型内容和目标的研究及转型期摩擦和矛盾的分析就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理论的重点。

经济转型理论把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推进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包含着放弃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针对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各个转型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失业、腐败等问题，推进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改革。

当今世界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较多，各国转型的具体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推行不同的市场经济，实行不同的转型步骤，转型的效果也很不一样。在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不同国家市场化的重点不同，如波兰、俄罗斯等国家重点在私有化，中国的重点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大猛击（big bang）式的“休克疗法”战略，我国则实行渐进（gradualism）式改革战略。虽然，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显著的高，经济增长率显著的低，甚至多年处于负增长。与此相反，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在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高水平（10%左右），通货膨胀率也比这些国家低得多。实践证明，渐进式的经济转型不但不会破坏生产力，还会由于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展而产生明显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

虽然中国的经济转型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战略，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实际上超过了实行“休克疗

法”的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也最低。于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转型阶段的成果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一些国外学者在比较中国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转型效果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比其他国家早；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推进经济改革而没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再一方面中国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中国实行的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这些因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经济转型较为稳定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在进入 21 世纪后，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仍不可回避，因此，以政府改革先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成为改革的新内容。与此相应的是，转型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改革与政府改革的相关关系。

1995 年初世界银行组织了一次关于第二次转型的讨论会。会议主持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诺 (Michael Bruno) 就第二次转型提出了三个论题：(1) 转型国家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2) 企业重组问题；(3) 法制建设，这涉及腐败问题。这三个论题也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课题。就第一个论题来说，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需要结构的调整来支持。就第二个论题来说，企业重组和产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重要的。就第三个论题来说，腐败可能破坏稳定甚至延缓改革的进程，因为它可能降低政治的可信度和对政府的信心。

关于第一个论题，建立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应该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经济转型国家大都面临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这可以用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来说明。短缺是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初期阶段的常态。由于短缺，政府和企业都有扩大投资的冲动，居民有着强烈的“消费饥渴症”。改革开始后，企业有了投资和经营自主权，地方政府也有了自己的

财力，再加上预算的软约束，各个方面的扩张冲动难以遏制，于是通货膨胀难以避免。

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不仅仅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也可能出现。现实中，一些转型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的停滞或衰退，甚至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就像俄罗斯从1991年开始实行“休克疗法”的改革，到今天其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原因在于激进的改革战略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政治的混乱秩序。

应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其制度摩擦较少，能够避免对生产力的破坏，因而在转型阶段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两种体制交织，旧体制下单纯追求产值增长而不顾效益的行为仍然顽强地起作用。有了投资自主权的企业由于决策能力差，而热衷于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这种行为还会得到地方政府或部门的保护（诸侯经济），当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的产品便会超过市场购买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产品的积压。因此而产生的市场问题会迫使经济增长率下降，更为严重的便是出现经济衰退和就业不足。

显然，在经济转型国家经济的不稳定可以表现为通货膨胀，也可能表现为经济停滞或衰退，也可能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课题自动担负起寻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使命。

面对转型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和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药方。在世界银行进行的关于第二次转型的讨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把旨在实现稳定和增长的第二次转型的重点概括为三个方面：（1）改革财政制度；（2）改革金融制度；（3）改革汇率制度。这涉及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关于第二个论题——企业重组。调整和优化企业结构的前提是根据市场化要求改革所有制结构。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二十多年后提出企业重组，意在明晰企业产权。明晰产权的途径，一是发展包括私有制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二是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有企业进行以明晰产权为内容的改革，将其改制为多元股权的公司制企业；三是企业间通过产权交易进行并购。

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市场化是在制度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属于卖方市场，商品严重短缺，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基本上带有“填空”的特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一方面，制度外的资源被充分动员，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也开始进入市场争夺资源，这就使非国有经济发展遇到资源限制；另一方面，许多领域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主要进入的制造业领域进入了买方市场，这些领域的竞争过度造成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势头减缓，效益下降。在这种市场新格局中，非国有经济成分要进一步扩大，就要进入国有经济已经进入的领域和市场，由此产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从而牵动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重组，其途径包括国有经济在所处的弱势领域的退和非国有经济的进。

企业重组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国有企业（也包括其他类型的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变动。现在已经明确，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此除了将一部分中小企业改制为私人企业外，相当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吸收私人资本、或其他法人资本的途径形成多元股权的公司制企业。

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相对应，私人企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私人企业的发展在许多地区已经不再表现为个数的增加，而是规模的扩大，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准入，即拆除私人企业进入许多生产领域的各种政策壁垒，准许外资进入的市场同样应对国内私人企业开放。再一方面是准许私人企业走

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关于第三个论题，是通过法制建设克服转型阶段的腐败。经济转型时期造成不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腐败问题。耶鲁大学教授苏珊·罗斯·阿克曼 (Susan Rose Ackerman) 认为，腐败在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中盛行，其原因是计划经济阻碍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它通过分配稀缺的物品和服务为“寻租”提供刺激。计划经济制度崩溃后，本来预计合法的自由市场的规则将普遍实行，不合法的“寻租”和其他的腐败将减少，但在现实中这种效应没有出现。腐败成为转型国家的共同问题。为什么？有人说，盛行腐败是转型国家增长的痛苦，但是腐败盛行将毁灭转型本身。

在苏珊·罗斯·阿克曼来看，在转型阶段腐败仍很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继续保持着对“钱袋”的控制，它们可能有“寻租”问题和其他内部交易。虽然市场化过程会因最终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减少腐败，但在现实中腐败没有因政府作用的减少而减少。人们可能试图在新的制度中创造新的“寻租”的路径。最坏的例子是人们决定退出第一经济，以防国家和其他知情者干预。

基于上述产生腐败的原因，克服腐败不仅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苏珊·罗斯·阿克曼所指出的，转型国家试图建立法律标准，同时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要通过去除或减少补助、贸易限制和政府购买中享受的优先待遇来减少“寻租”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国家应该尽可能有节制地管理经济。

应该说，改革和发展相协调是中国前一时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它也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转型所要坚持的准则。改革与发展是统一的。一方面改革能推动发展，目前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是经济体制的阻力，改革就是要克服这种阻力。另一方面发展也能推动改革。经济发展能减轻改革的阻力，为改

革创造宽松和良好的环境。从成本效益分析，改革的成本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改革的效益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较低成本的改革就是改革能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

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主题，结构调整是发展的主线。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的主要过程包括四个方面：（1）劳动者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2）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3）工业自身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4）服务业部门的结构转变。就我国目前来说，结构调整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其主题是产业升级；企业结构调整，其主题是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所有制结构调整，其主题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其主题是优化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贸易结构调整，其主题是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区域结构调整，其主题是区域间协调和共同发展。

现在经济转型目标已经非常清楚，经济转型效果也很明显，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际上存在的各种无序现象，而且潜伏的体制矛盾还在逐渐显示，特别要指出的是已有的改革也不是都成功的。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的无序现象，从中寻求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路径，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

针对经济转型已经出现和可能面临的矛盾，有必要研究经济转型的秩序，以保证较少摩擦较低成本地实现转型。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同时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并在转型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指导的基础上，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这里特别要求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第二，关注转型的路径依赖。根据青木昌彦的假定，经济体制所依存的历史的、社会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现存的制度会改革路径，造成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改革路径偏离目标。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需要解决改革路径所依赖的各种环境的改变。根据罗纳德·麦金农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理论，需要依据各个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解决好市场化改革的次序，防止因次序颠倒而产生的经济系统的混乱。

第三，发展是实现转型的动力。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无序和混乱现象，可以用改革和发展不相协调来说明。改革和发展的协调指的是，改革的任务必须由发展的任务提出，改革的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有多方面要求，改革的效应不可能同时满足发展的所有要求，某项改革措施的效应对某种发展要求可能有利，但对另一些要求可能不利，这就要从发展方面衡量改革的成本和效益。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从理论上说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不等于说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会立即带来发展效应。因此协调改革和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应该先行。

上述关于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内容及路径的介绍，同时也简述了本丛书所涉及的主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都是本学科学术骨干呕心沥血的力作，因此，本丛书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学科建设成果。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洪银兴

内容摘要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式创新活动的产生和持续产生理解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即经济发展总是由一次次的“创造性破坏”组成的，一个个市场均衡不断地被企业家式活动打破，再次实现均衡，再次被打破，如此反复。在熊彼特看来，这种“创造性破坏”总是由那些具有非享乐主义动机（尤其是“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的人做出的。因此，我们假设在特定的人口中有这种非享乐主义动机的人总是有一定的比例，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企业家式创新活动数量和规模有巨大的差异，尤

其是中国和美国？实际上是经济体制和制度差异使然。本书就是从企业家式创新活动涉及到的各个层面上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一个企业家行为的制度框架，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对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家行为模式进行了解释。

在导言中，我们将企业家行为界定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对稀缺资源进行协调做出的判断性决策。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家行为体现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上。本书所要分析的是做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是怎样受到激励和约束，以产生和持续产生技术创新。这些制度安排产生于企业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分工和合作关系中，这些分工和合作关系有几个方面：（1）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其中又分为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和普通外部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2）企业家和其他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合作关系。（3）企业家创新职能在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合作。（4）促进分工和合作的信任关系。这些分工和合作关系的产生和维持取决特定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所有权性质派生出来的资本合约、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企业家网络，而这些制度安排又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因此，从制度结构和行为背景中，我们可以确定特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

在第二章，我们将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纳入一个合作博弈模型中。企业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工和合作实际上是参与“企业家租金”的形成和分配。由于各方效用函数不一致和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各方往往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合作各方陷入了一种“囚犯困境”，要使合作各方走出“囚犯困境”取决于博弈各方支付结构改变，使得博弈双方获取稳定的合作回报，并使合作的未来具有足够大的影响。而博弈各方支付结构的改变又进一步取决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企业家所有权结构的创新，以及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具体分析各种企业家所有权安排之前，第三章对企业家所有权性质做出了界定，以此作为进一步展开分析的基础。企业家所有权产生的前提是企业家要素——判断性决策的非合约性。企业家所有权产生的背景是企业家要素或企业家能力成为决定企业生存或企业价值的相对重要的要素。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企业组织小型化和大量企业家式企业的兴起，为研究企业家所有权性质提供了现实背景。本章从对与企业家所有权界定有关的几种产权理论比较的角度，指出企业家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是为了解决企业其他成员以及自身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权，是因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较为重要，这又取决于企业资产的互补性程度。而从企业家式企业中的企业家所有权安排与大企业中的企业家所有权安排相比较的角度，我们进一步得出，企业家所有权（主要是就从大企业中剥离、分立出来的企业家式企业而言）的性质是为有效的保护和实现企业家要素创造出来的“纯利润”。

第四章到第九章分别从各个角度对企业家行为图景做结构性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在原则上与拥有财富没有关系”，但是“企业家只有先当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所以第四、五章从不同角色的资本所有者的角度，分别考察了风险资本合约与普通外部融资合约中企业家所有权安排。

在风险投资合约中，由于风险投资家不仅向企业家提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是，风险投资家拥有有关的产业知识建立新企业、制定市场战略等所需的组织、管理的技能和知识，其行为本质上也是企业家性质的，能够发现有前途的企业家，并积极地对之“培育”。因此，风险资本合约实质上是两种类型企业家之间的合约。企业家所有权安排取决于合约中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这包括两个方面：

(1) 剩余控制权安排。这取决于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企业

家在独立经营、出售部分股权和完全出售给风险投资家三者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企业家能力及显示其能力的信号在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之间的不对称状况。逆向选择问题在一个学习过程中可以得到缓和。即在多阶段投资中，风险投资家根据企业产生的现金流水平判断企业家能力，并与其自身能力相比，决定由谁来控制企业。而在企业家可替换（即替换企业家净收益为正）的情况下，最优风险资本合约是给予风险投资家控制权，以激励其努力搜寻职业经理，降低企业家处于控制地位时的“要挟”。

▼
▼
▼
(2) 剩余收益索取权安排。在企业资产特性对风险资本投资结构和预期的代理成本影响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家只分享固定比例的剩余收益，企业家分享的剩余收益随着企业总剩余收益水平变化而变化是最优合约安排。

第五章讨论了普通外部融资合约中的企业家所有权安排，这主要针对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分离的紧密持有的企业而言。企业家具有隐藏信息，而普通外部融资者是“不知情者”。双方关于剩余收益索取权安排体现为企业家的融资结构，进而取决于三方面因素：(1) 企业家风险偏好。企业家规避风险的偏好越强烈，企业家可能投入更多的抵押物，从而发行的无风险性债券比重较高，发行的股票则较少。(2) 资产特性。项目实施中形成的资产有形程度越高，企业家发行的无风险债券数量越多。(3) 企业信誉。企业家获得的信誉越多、发行无风险债券的数量越高。

双方关于剩余控制权安排的选择则存在一个顺序，即在“企业家控制”可行的条件下，首先选择“企业家控制”。如果“企业家控制”不能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就选择“状态依存控制”。如果“状态依存控制”仍然不能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最后选择“投资者控制”。相应地，有一个融资合约选择顺序，首先是无投票权的股票，其次是对投资者发行有部分投票权的证券或债券，最后是发行有投票权的股票。由于控制权安排实质上是双